

新疆戏剧论从

三

新疆戏剧论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主

编

目 录

试论王玉胡剧本创作的艺术构思

丁子人 余开伟..... 1

刘肖芜剧作艺术的美学思想

袁海燕 14

历史的明镜照古今

——评刘肖芜剧本《解忧》

雷茂奎 25

维吾尔戏剧的开拓者

——评介祖农·哈迪尔的剧本创作

蓝 兰 37

※

※

※

※

※

我国中古艺坛的新疆少数民族戏剧

尚久骞 吴云龙..... 52

《福乐智慧》之戏剧研究

姚宝瑄 77

※ ※ ※ ※ ※

浅论戏剧表现西部美

阿 灵 阿什河 108

新疆戏剧 诗意盎然

白多明 123

诗、乐、舞、戏融于一炉

——试论维吾尔戏剧

李肖冰 141

※ ※ ※ ※ ※

儿童戏剧管窥

冉 红 157

维吾尔叙事长诗的戏剧化

黎 蔷 172

编 后 记 199

试论王玉胡剧本创作的 艺术构思

丁子人 余开伟

王玉胡同志是一位努力描写新疆兄弟民族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家。他所创作的(或与其他作者合作的)电影剧本《哈森与加米拉》、《沙漠里的战斗》、《绿洲凯歌》及《塞外风云》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当然,它们的成功决定于很多因素,作家的立场和观点,作家所选择的主题与题材的社会意义,作家对兄弟民族各方面的生活的熟悉和理解的深度等等,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但是还有一点不能不看到,那就是作家在创作中在艺术构思上所花的工力与心血、精心的、成功的艺术构思往往在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突出人物的性格、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等方面,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很难想象,一个艺术构思平庸或失败的电影剧本能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能深刻表现作品的主题,完成作者所预期的对读者(观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王玉胡同志的电影创作在艺术构思上确有着不少自己的特色与成功经验,而这些又正是作家在努力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创作实践中所逐渐取得的。

从几个电影剧本中都可以看出，作家在进行自己作品的艺术构思时，总是紧紧地围绕着作品的主题，考虑到民族生活的某些社会的历史的特点，注意从多方面而来设计人物的命运及彼此的关系，构思矛盾的冲突，安排故事情节的发展，因而作品所展现的几乎是某一个兄弟民族生活的巨大的整体，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侧面。作家的艺术构思的触角往往深入到了所描写兄弟民族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各个角落及人物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根据主题的要求，对生活素材进行了精心的选择与提炼，并恰到好处地安排到作品中去。《绿洲凯歌》所描写的是一幅较为宏大的兄弟民族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图画，是一曲以维吾尔族人民向社会主义阔步前进的铿锵脚步声为基调的生活交响乐，因而使人鲜明地感到作品的气势磅礴，艺术容量比较博大，正因为作家是从整体生活的复杂关系及矛盾发展中来揭示与表现主题的，于是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建立在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深厚与坚实的生活的基础上，从而大大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力量。《绿洲凯歌》的主题能表现得如此突出和深刻，这正显出作家在艺术构思上的工力。

王玉胡同志的几个电影剧本的主题可以说都是比较单纯和集中的，不错，成功的电影剧本往往要求主题高度集中和尽可能的单纯，但是并不排斥剧本所描写的生活冲突的复杂错综及矛盾发展的曲折迴环与摇曳多姿。这是艺术中的对立的统一。我们觉得王玉胡同志在创作的艺术构思中正是努力做到使单纯集中的主题与错综复杂的生活的矛盾冲突、变化

多端的情节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后者环绕着前者而展开,前者依靠后者而深化。比如《塞外风云》,作者在紧张平叛战斗中,穿插了汉族解放军战士机枪手大个子甘愿承受违犯战场纪律的处分动用枪膛用水,抢救拾来的哈族牧民包特尔的婴孩的感人至深的戏剧情节,正是作家在艺术构思上独具匠心的例子。在这场戏中有波澜、有悬念、有充满意趣的性格冲突。它绘生绘色地揭示了我军战士的崇高精神面貌和恰如其分地烘托了我军高级指挥员(师长陈东海)的英明、睿智的决断,然而,这个精采的生活插曲的深刻意义及在剧本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此。因为剧本从这出发,继续描写了被机枪手大个子救活的婴孩再回到父母的手中、师长陈东海如何为婴孩取名“解放”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在兄弟民族中所发生的政治影响;再进一步又写到了包特尔在后来争取头目阿塞依、瓦解与孤立敌人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它正是紧密结合着剧本的主题要求来构思与安排的,反过来又对主题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极形象有力地体现了我党民族政策是多么光辉伟大。《塞外风云》中并不是单线条地描写我军师长陈东海领导的平息乌斯满叛乱这一场战斗,虽然这是整个作品主线,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作家却有意识地从多方面把哈萨克族人民当时所面临的复杂的矛盾展现出来。美国领事马克南表面上是那样虔诚地恭维哈族败类乌斯满,口口声声要帮助对方,实际上是以花言巧语的利诱作为钓饵,把其当作供美帝国主义驱使的工具,英领事乔治也企图混水摸鱼利用乌斯满叛乱在新疆打出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的反动旗帜,为英帝国主义争夺地盘。乌斯满虽然不可一世,气焰嚣张,以整个哈萨克族的“英雄”、“权威”自居,其实他在哈族人民的威摄力量与欺骗正在逐渐

破灭，他与人民的矛盾在不断激化。就是在哈萨克族上层头目中也因我党民族政策的感召产生着剧烈的分化……剧本相当深刻而又典型地概括了当时哈萨克族的社会面貌。这一些写得很具斤两的矛盾冲突的发生、变化、激化、消释又完全是受着剧本的主题的影响与左右，自然能为一体而不是互相游离，因而使作品显得更丰满、更具有灿烂的民族特色，更富于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我们知道，艺术构思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于生活素材的选择与提炼。艺术作品应该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具有显著性。作家应该从生活中提炼出足以体现时代特点和人物性格的东西，但是又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把生活中复杂的矛盾简单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突出作品的主题。王玉胡同志的电影创作正是遵循上述原则，按着生活本身的复杂面貌来展示主题的《绿洲凯歌》根据民族地区的生活特色，巧妙地把它主要地围绕着作为社会主义力量的代表，绿洲生产合作社主任巴拉提跟富裕中农托乎地一家人的矛盾为中心而展开戏剧冲突。正象生活本身那样，巴拉提与阿衣木罕的某些牵连，使得人物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在作为资本主义势力代表的托乎地一家，又存在着合作社队长阿衣木罕与丈夫奴尔丁的尖锐冲突及其他矛盾。

《绿洲凯歌》中安排了两次巴拉提与托乎地一家人的正面冲突。

第一次是托乎地家趁青黄不接时捣卖粮食。巴拉提当场赶到，人赃俱获，看来这场纠纷很快就会以巴拉提得胜而告终；但是作品并没有这样简单处理，而是展开了一系列的波澜：奴尔丁和那些倒买粮食的人都一口咬定是借粮而不是买卖粮食因而使巴拉提受阻，紧接巴拉提对买粮的人晓以利害

进行教育，买粮的人正要道出真情揭穿奴尔丁的犯法行为之际，偏偏在这时奴尔丁的嫂嫂麦来木罕又搬出巴拉提的妻子枣热汗也曾借去二升小麦这张“王牌”来反击巴拉提，使他一时词穷孤立；于是逼得他愤然而去，回到家里痛斥妻子，引起一场严重的家庭纠纷。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复杂的，巴拉提公而忘私对家里缺少照顾以致使妻子枣热罕在困难中上了麦来木罕的圈套，为奴尔丁抓去了反击巴拉提的把柄，从而又触发了巴拉提与枣热罕的冲突，使得形势微妙化起来。在这场戏中作家并没有把生活矛盾简单化，没有违反生活的客观规律而是在更高更深刻的程度上揭示了它。表现出兄弟民族地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种种的社会历史原因所带来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相反，如果使巴拉提轻易赢得了胜利，那就很可能会失去剧本现有的民族生活的特色和艺术魅力。

然而，剧本中巴拉提与托乎地一家人的第二次正面冲突，则是以社会主义正面力量而获胜的。这一场在反革命分子煽动下的大骚动，比上次买卖粮食问题的斗争更尖锐更严重，性质也更复杂。骚动的人群牵走了牲口、捣坏了粮仓、打伤了干部并抢劫了合作社的粮食。后来巴拉提率领了在野外劳动的广大群众赶了回来，与闹事的人两军对峙，作家在这场斗争结尾处给作品构思了一个极为精彩的富有诗意及民族特色的场面：当巴拉提义正词严地谴责与开导那些跟着闹事的群众以后，他高举着红旗迈开大步向前走去，并号召着大家：“愿意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跟着合作社走的人，就跟我来吧！”于是在红旗的后面顿时汇成一支声势浩大的群众队伍，闹事的人群中大部份人也拉着牲口背着粮食陆续加入这支阔步前进的队伍。向前进的巨大人流后面只有托乎地一家人和另外几个人孤零零地颓丧地留在原地。……这是多么别

出心裁的植根于维吾尔人民的民族性格的艺术构思！这个富有浓厚诗情及象征意义的戏剧场面多么有力地烘托了社会主义力量的磅礴气势与摄人威力，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就从中展翅高扬了……

二

当我们仔细阅读王玉胡同志的电影剧本后，还可以发现作家在进行艺术构思时，尽量在促使情节成为“人物性格的历史”。我们知道，构成情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物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因为人物依赖情节而展现性格，而情节的产生往往是基于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根据这一点，王玉胡同志在自己的剧作中总是把人物的个人命运与遭遇跟重大的政治斗争、社会冲突有机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与生活波折及在斗争中人物的内心冲突来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作家很善于把巨大的政治斗争的描写与细致的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交错结合，在尖锐的斗争中展示性格，性格的发展又有力地进一步推动着斗争。《绿洲凯歌》中正是维吾尔族妇女阿衣木罕的性格发展过程构成剧本的矛盾冲突的主线的。在整个故事中作家一直让她处于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的尖端。她的个人命运的遭遇被紧紧交织在绿洲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里面。阿衣木罕不幸误嫁给了奴尔丁，受尽欺辱和折磨，开始她只是一味地逆来顺受，即令是奴尔丁给她拳打脚踢、强逼她捧着《可兰经》赌咒时，她对这种残酷的折磨也还只能忍气吞声、对偶暗泣。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锻炼，她逐渐变得坚强起来了，不再是一个受践踏的弱者，她揭露了奴尔丁的投机倒把行为，敢于与丈夫正面斗争，并在闹

事的群众抢劫粮食时勇敢地毫无惧色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表现出她对社会主义事业无比忠诚的极宝贵的品质。阿依木罕的性格的历史正构成了《绿洲凯歌》的故事情节的主要脉络。在剧本中我们看到一个维吾尔族妇女阿依木罕性格发展与思想成熟以及逐渐摆脱家族、宗教及旧意识所给予她的不幸命运的历史发展的片断。并且，二者是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至于《哈森与加米拉》中的哈森与加米拉的富有传奇性的遭遇，剧本也未让其游离在本民族的政治斗争之外，逃脱了牧主居奴斯之手的哈森、加米拉会遭到一次再一次的被捕，又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收买与利用牧主居奴斯的阴谋纠缠在一起。他们的个人命运的坎坷正是当时阶级斗争与政治气候的反映，而只有随着政治斗争的胜利才终于获得了他们自己的个人幸福。

还应该指出，作家在构思“人物性格的历史”时，又是忠实于生活的逻辑、人物的阶级地位及特定的兄弟民族的社会环境。《塞外风云》中哈萨克部落头目阿塞依太吉的命运与性格的发展正是以他自己独有的形式出现的。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情节是与我军剿匪前线总指挥师长陈东海的谈判。作家为剧本构思了一场很精彩的戏：由于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阂等历史原因，阿塞依在谈判中始终不能消除对我军的疑虑；但当他送亲自参加这次谈判的陈东海师长后，他突然从包特尔处得知了陈东海的“剿匪前线总指挥”、“人民解放军师长”的身份，经过一阵惊愕与思索，他马上决定当天晚上就把部落带到解放军这边来。于是，费了陈东海、尼牙孜及包特尔多少口舌的争取阿塞依的工作在这里来了个急转直下的变化，获得了圆满的结果。在情节发展上，乍一看，它仿佛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但是仔细一推敲，又是“合乎情理之中”

的。关于阿塞依这个意外的转变与决定，他自己说过：“这很明白，他（指陈东海——引用者）既然亲自来跟我们谈判，就证明他们的诚意。再说，象这样勇敢智慧的人，乌斯满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作品在处理阿塞依最后抉择的艺术构思上不仅独具匠心，而且又完全合乎生活情理与人物性格的特点。作为哈萨克上层头目的阿塞依太吉，只会从陈东海这番行动中才能最后打消疑虑，并因此受到感化；而更重要的是从陈东海的勇敢与智慧中权衡出了继续跟着叛匪乌斯满走下去必然会导致自取灭亡的后果。于是这一切的主客观因素就统一在一个哈萨克民族上层人物形象阿塞依的性格中而促使他作出了投向解放军的最后抉择。

如果说作家在构思剧本的故事情节善于出奇制胜，不使它陷入平庸、呆板的话，我们以为这正是由于作家吸取了汉族古典戏剧中某些宝贵的经验及揉合了兄弟民族民间文学的某些传统手法所致。汉族古典戏剧传统中有一句老话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了情节成功的谜底，那就是“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为什么我们有些影片（或电影剧本）看了个头，就会知道结尾，看了前面就能猜出后面，这正是没有讲究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相反有些影片（或电影剧本）的故事情节固然曲折离奇，但却使人感到不真实，不可信，这正是不能“合乎情理之中”的缘故。而我们兄弟民族的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也常常在情节上以其新颖的、不落窠臼的艺术构思取胜。把这些融为一体，使之相辅相成，形成自己在情节构思上的特色，这是作家在电影剧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汉族及兄弟民族的传统艺术手法并予以推陈出新所作的极可贵的努力。前面所提到的《塞外风云》中阿依太吉在与我军谈判结束后突然迅速作出抉择的情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还可以从《绿洲凯歌》中找到成功的例证。当阿依木罕与奴尔丁的离婚被批准后，她马上兴高采烈奔向巴拉提家去告诉对方这个喜讯，剧本在这儿的抒情描写强烈地感染着读者，使我们也分享着女主人公的巨大喜悦。然而出乎读者意料之外也出乎阿依木罕的意料之外，阿拉提家是一片冷清、凌乱的景象，孩子满脸泪痕哭着要找妈妈，父亲满怀忧郁一筹莫展。阿依木罕充满幸福的憧憬的心一下子从兴奋的顶点堕入了失望的深渊。剧本描写她“就象突然受到什么打击似的，心情沉重而纷乱”。在这里我们窥见到人物内心的一场激烈的思想感情的冲突，一场个人爱情幸福的追求与崇高的道德观念的冲突，一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接着剧本写她“好象把心一狠，异常痛苦地但又是毅然决然地，匆匆走出门去”，甚至使阿拉提也意外而又奇怪地望着她的背影。这里作家所构思的人物的意外行动把人物的精神面貌推向了更高的境界，阿依木罕是忍着巨大的痛苦决定退出这场感情纠纷了。然而剧本在艺术构思上令人击节赞助的还是下面的情节发展，按一般作品的处理，阿依木罕这时可能跑回家去偷偷地痛哭一场来发泄自己感情上的苦痛（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作家抛弃了这一常见的构思，而是按着这个维吾尔族光辉的妇女形象的性格的特点把阿依木罕的精神又再一次地推向更高的境界，让我们进一步触摸到她的纯洁而高贵的心灵。阿依木罕从阿拉提家出来，马上又鼓起勇气走入枣热罕家的大门，忍受着对方所给予的冷淡与难堪，抑制着自己内心的深重的感情折磨，极力说服枣热罕与巴拉提重归和好。终于，阿依木罕的行动和真挚的表白感动了对方，使她们之间原有的隔阂都一时全部冰消了。这一场戏，一个意外接着一个意外，又紧扣着人物性格发展的情理，始终牢牢地吸引着与深深地激

动着读者，引导着读者进入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引起强烈的感情共鸣，从而获得莫大的启示与艺术享受，甚至使你很难一下子从剧本的形象里走出来，迫使你思索、回味、咀嚼着社会主义新人的情操的全部真谛。……作家就是这样带着对我们兄弟民族妇女满怀的激情，遵循着“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的艺术法则来进行艺术构思的，努力发掘了生活中的诗意的动人的东西，经过提炼、创造与巧妙安排，于是组成剧本中这些闪光的篇章。

三

通过王玉胡同志的几个电影剧本，可以看出由于作家长期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了兄弟民族人民生活旋涡中，因而对于哈维两族人民的风俗民情、生活环境、语言特长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强烈的喜爱。因而，在他进行作品的艺术构思过程中，都极其自然的融进了浓郁的哈萨克草原风味和清新、欢快的维吾尔生活的情调，并把它们与重大的政治斗争有机地巧妙地揉合一起。这几乎形成了王玉胡同志电影剧作的重要的赢得读者喜爱的特色。

王玉胡同志十分善于通过对兄弟民族传统的民间习俗的描写，创造出一种激烈而轻快的节奏气氛和激荡人心的优美的抒情旋律，从而反映出兄弟民族豪放、乐观、精骑勇斗、能歌善舞的可爱的性格风貌。更可贵的是、作家所进行的这些描写并不是游离在感情之外的、而是与整个情节发展密不可分的，是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有力陪衬。《哈森与加米拉》“姑娘追”那场精彩的风俗画面的描写、自然使我们心旷神怡地领略了哈萨克族饶有风趣的习俗、给剧本感染了强烈的沁

人心脾的草原气息。然而赛马过程中帕的夏伯克对加米拉的庸俗调戏及加米拉最后鞭打对方于马下这些生动的镜头、不正有力地揭露了帕的夏伯克的邪恶无耻和绘声绘色地烘托了加米拉这个哈萨克姑娘的泼辣和勇敢吗？也正由此而开始种下了尤奴斯父子以后恶毒迫害加米拉的根由、这样、“姑娘追”这一段哈族风习的描写就成了故事矛盾冲突迅速展开的一根引线了。《绿洲凯歌》中乌守尔和艾夏木罕的婚礼及随后举行的“麦西来甫”（维族载歌载舞的民间游艺晚会）。那更是维族人民优美习俗和多采的生活的真实写照。道貌岸然的毛拉向新娘新郎所执行的婚教仪式、固然颇使人沉闷、然而从中我们不难窥见维族人民民间婚礼独特的传统的礼节；而灯火辉煌的葡萄架下、男男女女唱着情歌翩翩起舞。又极其和谐地构成了一种优美、欢乐的抒情色调。然而，作家着力描写这场“麦西来甫”晚会的主要目的显然还在于通过它来刻画人物性格与推进戏剧冲突的发展。由于托乎地一家的折磨，使阿衣木罕精神上一直是抑郁寡欢很少笑颜，在自己妹妹热烈的婚礼舞会上，巴拉提邀她对舞了，可是偏偏在这短暂幸福的时刻，刻薄的麦来木罕却当众对其进行恶言中伤，使阿衣木罕的满怀兴致顿时冰消，痛苦和屈辱交织于心，而匆匆退场。这儿，阿衣木罕出色的舞蹈感染了浓郁的维吾尔生活的抒情色彩，给女主人公增添了更其令人喜爱的美好光辉，但也揭示了人物心灵深处的隐痛与矛盾。看来是对于民族生活风习的描写，却又使我们对阿衣木罕留下更深的印象，一箭双雕，这正是作家在艺术构思上匠心之处，而麦来木罕对她的攻击，则又是扎乎地和奴尔丁所酝酿的巨大阴谋中一个侧面的暗示，发生着戏剧冲突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觉得，与王玉胡同志正在努力地逐步地形成自己创

作中激越、轻快、富于抒情的个人风格有关，作家在艺术构思中还特别注意到使剧本轻重疏密、浓淡虚实极尽其妙的节奏感。紧张的斗争、缠绵的爱情，严肃复杂的谈判，轻快欢乐的歌舞，罪恶的阴谋，胜利的喜悦……在剧本中彼此相错，相辅相成。明智的作家在自己进行艺术构思时，总是充分估计到读者（观众）的想象能力，通过剧本的节奏处理及民族生活情调的点染，给读者（观众）以回味的余地，想象的愉悦。而避免了剧本的一味紧张或一味舒缓，致使读者（观众）感到喘不过气来或者是索然寡味。比如《哈森与加米拉》中第十四节里，前半部以极浓的抒情调子描写了哈森和加米拉给孩子取名，过满月，请喜鹊、乌鸦、老鹰作客的这些极具民族色彩的诗意的情景，紧接着就是由鹰的盘旋（又多么富于民族特色）招来了哈达的马队，一场紧张的战斗后，哈森和加米拉再次被捕，婴儿也被弃于荒山。强烈的对比与跌宕增强了剧本冲击读者情绪的艺术力量。

此外，无论是哈森和加米拉在河边的幽会或是艾夏木罕与乌守尔在果园嬉戏都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情调的芬芳；而在尼亚孜团长关于哈萨克人好客风尚的畅谈中，或是阿塞依与陈东海谈判后赠送马匹的礼节描写上，甚至乌斯满叛匪祭旗赌咒的仪式，马克南割羊耳、羊肉的细节动作，又是多么充分的表现出民族风习的迷人的艺术魅力。这一切的细节描写都有赖于作家巧妙的艺术构思把它们熔铸在作品里面不露一丝外加或斧凿的痕迹，这需要一个作家，特别是用本民族语言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汉族作家，付出多少辛勤的刻苦的艺术劳动呵！

作为王玉胡同志电影剧本的读者，我们欣喜的看到，由于作家在努力反映兄弟民族生活斗争上所付出的艰巨劳动，

使他们的创作逐渐形成自己艺术构思上的特色。这些特色正是由作家所描写的主题、题材的特点所决定的，而它们又反过来帮助作家更深刻更完美地去表现兄弟民族的生活斗争。显然，这里是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及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值得探讨的。对于电影剧作，我们还是门外汉，上面这些粗疏的意见很不成熟，借此就教于王玉胡同志和广大读者。

1962年3月·乌鲁木齐